

概论宋代混融三教的文字禅

麻天祥, 段淑云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麻天祥(1948), 男, 河南郑州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宗教学与宗教哲学研究; 段淑云(1977), 女, 河南辉县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宗教学与宗教社会学研究。

[摘要] 禅宗意境虽不可说, 但却可以借助文字有所显示。文字禅所强调的“文以载道”, 即是谓此。宋代文字禅的兴起, 使禅宗语言哲学完成了由不立文字、道断语言, 到不离文字、不执文字的无痕换骨, 充分展现了禅宗在语言哲学和方法论上的无穷魅力。

[关键词] 文字禅; 不离文字; 不执文字

[中图分类号] B94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 0728-05

禅自汉代传入中土, 始终同老庄哲学不离不弃, 紧密相连。道安在《鼻奈耶序》中在谈到禅的早期发展时, 指出:“自经流秦土, 有自来矣……以斯邦人老庄教行, 与方等经兼忘相似, 故因风易行也。”而梁慧皎在《习禅传论》中也明确指出:“禅也者, 妙万物而为言, 故能无法不缘, 无境不察”, 走的完全是老庄哲学的路子。魏晋玄风飙起, 佛学自然与易、老、庄三玄同气, 当然也不能摆脱儒家“文以载道”的影响, 因而同玄学言、象、意之辨遥相呼应, 在说明禅的超越精神难以言喻的同时, 又强调语言文字是实现禅的终极追求不可或缺的工具, 即所谓“禅非文字, 借文字以显”的指月关系。而且, 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 儒、释、道交相渗透, “不立文字”的禅事实上也就不能不接受“不离文字”的挑战。于是, 文字禅, 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宗教语言哲学便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 特别是伴随着我国禅宗的发展, 而悄然兴起了。

入宋以来, 儒家汲取佛理而在哲学上得以深化, 禅门则进一步受到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熏染。理学高居庙堂, 禅风席卷天下, 文人学士侧身佛门, 与禅僧诗词酬唱, 讲论性命天道之理, 禅风尤其为之一变。特别是惠洪在理论和实践上公开倡导文字禅, 与儒、释、道三教混融同步发展, 把文字禅“不离文字”、“不执文字”的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宋代以降, 虽然文字禅经真可、德清、元来、元贤等人苦心经营, 多少也有所发展。但是, 从总体上讲, 并未超越宋代惠洪等人确定下来的理论格局。因此, 宋代混融三教的文字禅在我国文字禅史上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而这也正是本文集中探讨宋代文字禅的根本缘由。下面我们就从宋代文字禅兴起的缘由、宋代文字禅的发展及其理论依据以及不立文字、不离文字与不执文字的辩证关系这样三个方面对混融三教的宋代文字禅展开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说明。

一、宋代文字禅兴起的缘由

宋代文字禅的兴起既有禅宗自身方面的原因, 也有外在环境方面的原因。

首先, 就禅宗自身而言, 唐僧慧能强调“本性自有般若之智, 自用智慧观照, 不假文字”^[1](第28页), 确定了禅宗对待文字语言态度的基调, 即: 轻蔑文字语言, 摒弃知性思维, 即所谓“顿悟”的直观体验。显

而易见,禅宗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在吸收道家“言意之辩”的思维方式的情况下,成就了“不立文字”的命题的。从哲学史上看,“言意之辩”源于《易传》和《庄子》,涉及的是超越有限的终极关怀,或者说本体究竟能否用名、言表达的问题,即言的功能和局限性的问题。《周易·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2](第181页)的说法。而庄子则明确提出“得意忘言”的思想。《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3](第482页)!“筌”、“蹄”、“言”都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或意义本身。庄子认为语言虽可传意,但它所表达的,只是具体事物的现象,而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意却是一种心灵境界,是抽象玄妙、遍于一切的道。因此,言难尽意,故不能执著语言文字的偏执和表象,而需“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就是“得意忘言”。

事物之理属于“有”的范畴;终极之理则属于“无”的范畴。前者用言、象可以认识和把握,后者则是超言绝象的。如果执著于言和象,反而会妨碍意的获得。可见,言、象和意的区别,是现象与本体、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区别。有限的语言、物象自然也就不能尽无限之意了。

正是由于老庄哲学的浸渍和玄学的逼迫性改造,“妙万物以为言”的禅的境界,也就是佛教觉悟的境界,自然而然地成为绝对超越的终极关怀,而存在于人的知解之外,故有“不落言诠”、“不着两边”、“羚羊挂角”诸如此类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之说。慧能认为佛性本净,离言离相,对禅的认知和把握,对自心本性的证悟,只能靠自身实践,而非言教。“说似一物即不中”,可谓一语道破了语言的局限性。

慧能以下的禅门弟子常用隐晦含蓄或不着边际的“机语”,乃至棒喝的手段,表达超越言象的意境,其目的不过是要启发禅者破除对待,直指本心,也是实现超越、自觉觉他的方便施設或权宜手段。然而,原本“静趋空灵”的“方便”,或者说实现目的的手段,却被后世禅宗弟子奉为明心见性的不二法门,将语言文字的局限性绝对化而予以排斥,甚至走向呵佛骂祖、非经毁教的极端。

禅宗为了强调道在妙悟、非关文字,甚至杜撰了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着力渲染以心传心的付法方式。其实释迦牟尼本人也是重视语言文字,重视运用语言文字宣说教义的,三藏十二部汗牛充栋的典籍即是明证。玄奘不惜生命,西渡流沙,耗十七年之心力西行求法,又积十九年之血汗翻译佛典,当然是为了求取佛经原本,借文字传达佛教真义,绝非不立文字。恰恰相反,佛教哲学中不一不异、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有不无、“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理绝四句,体超百非”的终极关怀,尽管在言象之外,但还是以遮诠的方式,即否定的方式,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实际上,禅固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尽致,然仍需借语言文字而显精义,舍此则别无他途。因此,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便不是舍弃语言,而是如何突破语言的局限。宋代文字禅“不离文字”、“不执文字”的根本原则无疑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另外,两宋社会相对稳定,士大夫与僧人频繁交往,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张商英、苏轼,以及理学家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也多参禅或出入佛老,以诗文与方外人谈禅论道,丛林重文字的风气也不胫而走,形成了符合中国主流文化精神的新禅风——由不立文字到文字禅的转变。禅师们在研究旧经典的基础上对禅语加强文字润色,显得文采飞扬,形成了禅宗新典籍。正是这样的禅宗新典籍,既成为禅僧教禅、习禅的教材,又在最大程度上适应了文人士大夫的口味,使禅宗在上流社会得以广泛的传播。总之,没有宋代文字禅的兴起和发展,也就没有禅宗在宋明哲学史上的地位,更没有禅宗思想在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渗透。

应当强调的是,禅宗初起,以“不立文字”为高尚;禅学日进,则必以文字为助缘。禅境幽玄虽不可说,但宋代“借文字以显”的文字禅实际上强调的是“文以载道”,与儒家哲学同气相求。不离文字,不执文字应当说是禅宗语言哲学和禅学方法论的真谛。

二、宋代文字禅的发展及其理论依据

在宋代禅宗哲学史上,为文字禅做出巨大贡献的主要有,善昭、重显、克勤和惠洪。

一般认为临济宗的六世传人汾阳善昭(947-1024)是文字禅新风的开创者。善昭所作的《颂古百则》汇集前代公案,用偈颂加以陈述,俗称“颂古”。通俗地说,就是禅师以公案为例,用诗词韵语给予解释与评议,是对闪烁其词的公案所进行的语言文字说明。

按照善昭的说法,古代禅师的言行是“随机利物”,学者因之而“各人解悟”。所以,禅师以文字语言示禅,学徒通过文字语言解悟,文字语言成了禅可“示”可“悟”的中介。参究古人语录公案,等于悟解禅的真谛,故亦名“参玄”。

善昭的主张,代表了中国禅宗演变的一个方向,从“说似一物即不中”,经过五代十国对语录公案的自发讨论,转变而成“了万法于一言”的理论自觉。如此,参禅就可以变成名副其实的“参玄”,对禅境的追求,也就变成对含“玄”的语录公案的知解。

善昭有三诀、三句,然而他尤其重视的是临济之三玄三要。他认为:“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意忘言道易亲。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日菊花新”^①。在善昭看来,所谓三玄三要是难以把握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关键是“得意”,而得意的途径仍然有赖于语言和文字,只不过要“得意忘言”,才能够会通而得玄旨。这里他实际上强调的是语言文字对玄理的把握和表达,即语言文字在“得意”中的功能。这也就为文字禅在理论上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所谓道本无言,借言以显,得意忘言,应当说不仅是文字禅,而且是所有禅家,甚至说是一切玄学家遵循的基本规则。

这里,略举“俱胝一指”这则公案,以见善昭文字禅之一斑。俱胝是唐代的禅师,奉持一指头禅的禅法,他常竖一指,启导弟子开悟,故而禅门有“俱胝竖指”或“俱胝一指”的公案。汾阳善昭的颂文是:

天龙一指悟俱胝,当下无私物匪齐。

万互千差宁别说,直教今古勿针锥^②。

颂文的意思是,俱胝从天龙禅师学得一指头禅法,从竖一指的动作,悟得万物的真相。众生当下一念无私无我,万物就没有不齐一的,无私则齐物。体悟无私齐物的禅意,也就不分彼此,不作针锥之别了。这里显然有《庄子》齐物论的痕迹。

可以看出,善昭的颂古总是从那些谜语式的公案出发,借语言文字,推衍古圣玄旨。此后,凡有文化的禅僧纷纷研习颂古,从古则和颂文中体悟、发明禅意。

稍晚于善昭的另一文字禅的重要人物是云门宗的雪窦重显(981-1053)。雪窦重显仿照善昭的做法,也作了《颂古百则》,把颂古之风推向高潮。仍以“俱胝一指”一则公案为例,雪窦重显的颂文是:

对扬深爱老俱胝,宇宙空来更有谁?

曾向沧溟下浮木,夜涛相共接盲龟^③。

前两句大意是:宇宙本空,万般归一,抑扬古人,深爱俱胝。后两句是引用《法华经》关于“如一眼之龟,值浮木孔,无没溺之患”的寓言,说明俱胝和尚以一指示人,如同在夜幕笼罩下波涛汹涌的大海投放一浮木,拯救沦溺于生死中的芸芸众生。可见,颂文不仅有助于对公案的理解,还富有新意和文学色彩。

重显好用经典,又善于将情感融入其中,使他的颂古之作显得文采斐然。其上堂小参、举古勘辨,都很注意辞藻修饰,深受文人学士之喜爱。所谓“雪窦以辨博之才,美意变弄,求新琢巧,继汾阳之后,笼络当世学者,宗风由此一变矣”^④。至于后来的禅僧纷纷仿效,拈弄颂古之葛藤,即言定旨,滞句迷源,那就不能说是重显的责任了。

重显之后,圆悟克勤曾给了颂古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⑤,虽然是说,但“不说破”。既然是“绕”,就需要丰富的知识和驾轻就熟的文字功底。对此,多数禅僧也只能望洋兴叹。正所谓“银山铁壁,孰敢钻研;蚊咬铁牛,难为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济宗杨岐派禅师圆悟克勤(1089~1163)作《碧岩集》开评唱之先河,把颂古发展成为兼有说、评、颂、唱的通俗形式和通俗内容。

《碧岩集》是对重显颂古百则的评唱,全书十卷,每卷十则,每则分为五项,依次是“垂示”、公案“本则”、重显“颂文”、“善语”和“评唱”。“评唱”是主体部分,是对公案的文字诠释。他旁征博引,提要钩玄,

时而简单捷说,如数家珍;时而机锋毕露,发人深思,把文字禅风推向高潮。后之曹洞宗人投子义青、丹霞子淳以及宏智正觉等人也都有“颂古”之作,文字优美,思想清新,以文字说禅之风有增无减。

另外,像许多高僧一样,克勤出身儒门,于儒释贯通亦不遗余力。《克勤传》中载其有答康王问曰:“陛下以孝心治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统万殊,真俗虽异,一心初无间然”,将佛教最受非议的行为与儒家的孝以一心贯之,也是儒佛会通最显著的特点和最受欢迎的方式。

倡创颂古之风的是善昭,把颂古之风推向高潮的是重显,开评唱先河的是克勤。进一步从理论上为文字禅寻找合理性依据的当首推惠洪。

惠洪(1071~1128),作为一名临济宗禅师,他先后住持过临川北禅寺、金陵清凉寺等多处寺院,精通禅学,与当时有影响的著名禅师关系密切,享誉于江南丛林;作为一名饱学僧侣,他博闻强记,精通佛典,才华出众,知名于京城及江南士大夫阶层;作为一名文字禅的倡导者,他把辑录自己诗、偈、书、序等的书定名为《石门文字禅》,并在许多著作中论述文字禅的历史及其合理性。

惠洪反对把禅与语言文字割裂开来,在《石门文字禅》中他指出:“禅宗学者,自元丰(1078~1085)以来,师法大坏,诸方以拨去文字为禅,以口耳受授为妙”。他特别推崇汾阳善昭,认为“淳化(990~994)以后宗师,无出汾阳禅师之右者”。因为善昭重视临济义玄提出的“三玄三要”,并通过对它的新解释,追求玄言,提高文字语言在明心见性过程中的功能。惠洪通过联系讲解善昭关于三玄三要的颂文,实现以文解禅。他说:“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见,此第一句也,古(指荐福承古禅师)谓之句中玄”^⑦。“言通大道”便是惠洪所倡文字禅的根本依据。惠洪也正是借助义玄、善昭的玄要之谈,打开了通向文字禅之坦途的。他充分发挥三玄三要的内蕴,阐明言和意、文和禅的表里关系,突出了语言文字在明心见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把着眼点放在“一句该万象”和“得意忘言”上,因而分三玄为:体中玄、句中玄和意中玄,从而突出“玄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见”这一文字禅的根本精神。

惠洪在《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五中指出:“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候。”所以语言又可以说是内在精神的表征,得道与否,也可以从使用的语言中获得信息。其实,惠洪的意思是要“隐显相参,借言以显无言,然言中无言之趣,妙至幽玄”。也就是说,一方面不能把语言文字与心体割裂开来,要用“言”突显“无言”使人能体会到“幽玄”之旨;另一方面,这有形而显的语言文字绝不是“实无巧妙”,“随意答之”的,而是体悟幽玄之旨的佳文妙语。

可见,惠洪的文字禅是要使语言文字摆脱它的有限性,不断扩充它的功能,使其准确地表述超越相对、不落两边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学者或听者循着同样的心路而达到无住、无念、无相,即不执著于体相意念的意境。这种不离文字、不执文字的态度,既是对禅宗哲学的建树,也是对禅家不立文字的终极追求的实践。

惠洪倡导的文字禅特别能为士大夫所接受,苏东坡是其中的突出的一位。惠洪在《石门文字禅》中评论说:“东坡居士,游戏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饰万象。”肯定、运用文字禅的禅师和士大夫,既使文学走进佛事达到了自觉,也使文学步入禅境达到了自觉。

三、不立文字、不离文字与不执文字的辩证关系

禅是一种意境,一种超越相对、涵盖相对、游行自在的意境。所以,禅是难以言说的,语言文字也就被视为障道之本,而有不立文字之说。但是以自觉觉他、自度度人为社会关怀的佛教,当然包括禅宗,还是要凭借语言文字交流授受禅的体验和知解,除非仅止于自觉、自度。更何况,语言文字的本身也可能成为禅的表征。宋代混融三教的文字禅的兴起,实际上是禅宗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地表现了禅学在方法上不离文字与不执文字的辩证关系。它涉及到经验知识与哲学智慧、直觉体悟与逻辑分析、信行与知解等问题,目标总在不可言说的超越之境界,在方法论上则强调不离文字而又不执文字的“不思之

思”,凭借语言文字的超现实功能进至无限。

《楞严经》卷二谈及语言与佛法时说:“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宗密在《禅源诸论集都序》中述达摩西来意时用此指月之喻说:“令知月不在指,法在汝心。”虽然没有指头就不能指月亮,但指头与月亮绝不是能相互替代的等义物体。人的手指指示了月亮,就像语言指示了语义。如果一味执著于语言本身探求语义,就像以手指为月体一样地落入谬误。《楞严经》的指月之喻表明语言相对于语义来说,只是一个指示而已,亦即《祖堂集》卷四中,唐释丹霞天然禅师《玩珠吟》诗中所说:“演教非为教,闻名不认名。见月休看指,归家罢问程。”他们说的都是不离文字而又不执文字的意思。

事实上,历史上的禅宗大德都是不离文字、不执文字的。《大正藏》卷二十二中所谓“言语道断,而未始无言。心法双亡,而率相传法。有得兔忘蹄之妙,无执指为月之迷”,即是谓此。至于那些主张不立文字者,也往往不能真正脱离文字,禅宗史上汗牛充栋的典籍即为明证。因而,宋代文字禅的兴起是禅宗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之势。当然,那些主张不离文字者,也并未真正执著于文字。例如公开倡导文字禅的惠洪在《临济宗旨》中,于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的禅机,把玩得水泄不通。

总而言之,宋代文字禅,完成了禅宗由不立文字、道断语言,到不离文字、不执文字的无痕换骨,显然也是三教一体的结果,是在思想和方法上向“文以载道”的儒教哲学的靠拢和汲纳,当然也是禅宗在理性升华中的必然趋势。

注 释:

①② 参见《大正藏》卷四十七第597、609页。

③④⑤⑥ 参见《大正藏》卷四十八第159、1036、141、139页。

⑦参见《卮言藏经》第三者111册,第173页。

[参 考 文 献]

[1] 慧 能. 坛经[M]. 杨曾文,校.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2] 任继愈. 老子新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 马恒君. 庄子正宗[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the Written Zen of Merging Three Religion in Song Dynasty

MA Tianxiang DUAN Shuyun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MA Tianxiang (1948),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religion and religion philosophy; DUAN Shuyun (1977), female, Graduate, majoring in religion and religion sociology.

Abstract: The unfathomable realm of Zen is too mysterious to talk, but it may be show by words. What Written Zen of Song Dynasty emphasizes just is such a kind of possibility. The rise of Written Zen has led to the ingenious change of Ze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rom the denial of word and writing to the inseparation and non-adherence of writing. This shows fullest the infinite charm of Zen in the fields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methodology.

Key words: written Zen; inseparation of writing; non-adherence of writing